

# 劉向《詩》學傳承問題及其與 西漢政治現實關係重探\*

陳志峰\*\*

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 摘 要

劉向 (77 B.C.-6 B.C.) 無《詩》學專門著述，而《詩》說散見《列女傳》、《說苑》、《新序》與所上疏奏之中，是兩漢引《詩》頻率最高之學者。本文由此並就《漢書·楚元王傳》中論其《詩》學問題及其與政治之關係，爰釐三題：一、劉向為「魯詩說」之疑礙及其所序三書相關問題；二、劉向所序三書關涉之政治現實及其稱《詩》問題；三、本傳所載劉向疏奏引《詩》考論。經討論，本文以為：以劉向傳《魯詩》之說多有疑礙，當以宏通視野觀之；所序書中，唯《列女傳》最切時弊，具強烈之政治現實目的，與《說苑》、《新序》全面論述王道之政不同；最後，本文以為劉向所上元、成二帝疏奏，以陰陽災異扣合《詩》說，異於三書，是其直接著作，而切合潮流與其學術歷程，更是其諫官本色之展現。

**關鍵詞：**劉向，《詩經》，《列女傳》，《說苑》，《新序》，《魯詩》

---

\* 本文初稿以〈劉向稱《詩》與西漢《詩》學風尚〉為題，嘗於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之「第十四屆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臺北：2022年5月28日）中發表，渥蒙特約討論人車行健教授與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指示修改方向、訂補拙文，謹致無上謝忱。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fongbig@gmail.com

## 一、前言

兩漢學術之發展，以經學最具代表，皮錫瑞 (1850-1908)《經學歷史》定為「經學昌明時代」，又言「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數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其言《詩》謂「以三百篇當諫書」，<sup>1</sup>頗能概見此代《詩經》切用於世之面貌。皮氏更言：「武帝以公孫弘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元帝尤好儒生，韋、匡、貢、薛，並致輔相。自後公卿之位，未有不從經術進者。」<sup>2</sup>就經學發展而言，此固經書學理義蘊掘發之重要時期，故言大昌、純正不雜；就經術而言，經生仕進之後，以經治政，開展出「通經治用」之經學局勢，遂言「有用」。<sup>3</sup>

劉向 (77 B.C.-6 B.C.) 為漢高祖少弟楚元王劉交 (?-178 B.C.) 之後，是西漢重要《詩》學者。其先後歷仕宣、元、成三朝，曾在宣帝時親與石渠閣會議；元帝即位之初，又以「宗室忠直，明經有行」為太傅蕭望之 (?-46 B.C.)、少傅周堪（生卒年不詳）所薦舉而共輔朝政；成帝河平三年 (26 B.C.) 更領校中祕書，為中國典籍發展之重要事件。

劉向之傳，附於《漢書·楚元王傳》後，云：「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sup>4</sup>其務於經術以求世用，又以善觀星宿，故所上疏奏多有言星象災異者。班固 (32-92)《漢書·楚元王傳》後乃「贊」曰：

自孔子後，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卷 36，頁

<sup>1</sup>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增註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頁 60、85。

<sup>2</sup> 同前引，頁 98。

<sup>3</sup> 漢代經學特色之一，在於講究通經致用。朱維錚指出：「有人說他〔案：指武帝〕愛好儒學，那是混淆『學』與『術』的概念。他同意博士官變成五經家的專利，儒學也改稱經學，可是在以後四十多年裡，表明他對經學有興趣的事件，只有兩則。」「他真正感興趣的，是儒術，即經術。」又言：「五經博士大多只守住一種經典及其師傳的解說，在與時俱變的政治中要求某個側面表現『致用』的專長，形成經術實踐的分工。」朱維錚，《帝制中國初期的儒術》（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頁 50-51、56。朱氏所言即是針對皮錫瑞《經學歷史》所論「〈禹貢〉治河」等事而發。本文此處分論經學與經術，惠蒙匿名審查委員啟發，特此致謝。

<sup>4</sup> 班固著，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36，頁 1963。後文如再引及此本，隨文括弧標記卷次、頁數，以省篇幅。

1972 )

劉向校書十餘年，序有《列女傳》、《新序》、《說苑》諸書，多據中祕所藏書傳舊籍予以序次，歷來學者多有將此三書視為「戒天子」之諫書者，班固論列綴文之士，將劉向與孟、荀等數人並列，言其「博物洽聞，通達古今」，有以也。

西漢《詩》學諸家，今見於《漢書·藝文志》者有今文齊、魯、韓三家與古文毛氏。劉向雖無《詩》學專著，然所序《列女傳》、《新序》、《說苑》三書引《詩》之多卻是兩漢之最；復以歷年所上漢帝疏奏，不乏引《詩》諫議之例，皆可據以考見劉向《詩》說內涵。其先祖楚元王少時曾與申培 (219 B.C.-135 B.C.) 學《詩》於荀子門人浮丘伯 (生卒年不詳)，後又遣子郢客 (?-174 B.C.) 與申培學於浮丘伯，知楚元王劉交實雅好《詩》學。

據《漢書》所載，申培為《魯詩》而元王亦有《元王詩》，自兩宋後輯佚今文《詩》者多將劉向家族歸於《魯詩》一系。然此種觀點，牽涉問題不小，既與劉向家族《詩》學傳承相關，又與劉向所序《列女傳》、《新序》、《說苑》三書及所上疏奏之書籍性質與對象，密切關涉。倘不能一一為之辨清，則劉向《詩》說相關問題之學術義蘊，不免過度簡化，而致使西漢學術與政局之互動關聯隱晦不彰。本文基於此意而發，分節討論劉向相關著述之引《詩》問題。首先論劉向為《魯詩》之說法，實有不少疑礙之處，宜就博通之觀點論其引《詩》，以見劉向《詩》學之實貌；次則針對所序《列女傳》、《新序》、《說苑》三書引《詩》之政治目的，由以《詩》諫書之角度衡之，論三書所欲諫議之政治現實問題，既有對君王之正面建言，亦有針對西漢成帝以後外戚干政之直接勸諫，三書目的實不同，不應等視之；三則以《楚元王傳》所載劉向疏奏，以之為直接材料，視為劉向《詩》學最重要之著述，其引《詩》用意，不應與三書合觀，而當就疏奏所陳之歷史現實，析其引《詩》具體目的，以見劉向《詩》學之切於世用。

## 二、劉向為「魯詩說」之疑礙及其所序三書相關問題

西漢經學之發展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後，逐漸鼎盛；洎乎章帝，分立諸家博士，師法章句，由是大興。以《詩》一經而論，在《漢書·藝文志》中載：「《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卷 30，頁 1707-1708）六家者，齊、魯、韓、后氏、孫氏、毛氏，今毛氏因鄭玄

《箋》故，致使《毛詩》大行，齊、魯、韓先後亡於魏、西晉與北宋。<sup>5</sup> 今文三家詩雖亡佚，然其說頗見引載籍，故自南宋王應麟 (1223-1296)《詩考》後，屢有學者對三家詩說之輯佚與鑑別進行細緻研索，對今文三家傳承屢有辨析，由是引出輯佚、鑑別方法之討論。

劉向係中國目錄學史上之重要學者，亦是西漢以通經而致用之代表人物，其家自有經學源流，尤以《詩》之一經最為彰著。《漢書·楚元王傳》載，劉向先祖劉交為楚元王，元王者高祖劉邦之少弟也。傳云：

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卷 36，頁 1921-1922)

元王之後，頗有好《詩》者，又以此傳文故，學者多定劉向乃傳《魯詩》者。然此段傳文所可留意者有二：其一，《魯詩》傳自申公，而申公與元王俱受《詩》於荀子門人浮丘伯門下。其二，《元王詩》與《魯詩》並稱，則《元王詩》非《魯詩》之流裔，亦可知也。

西漢《詩》學，三家獨盛，而論西漢《詩》學者首要之務輒在家派歸屬。首先對劉向《詩》說進行歸類者，當屬宋代范處義（生卒年不詳）。其《詩補傳》云：

《荀卿子》、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引《詩》之言，與毛義絕異，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乃荀卿門人。楚元王交亦學浮丘之《詩》。向乃元王之孫，則荀卿、劉向乃《魯詩》之源流也。<sup>6</sup>

范處義雖非三家輯佚學者，然此法、此說俱為王應麟所承，幾為後來學者奉為定說。王應麟《詩考》云：

<sup>5</sup> 魏徵 (508-643)《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范家相 (?-1768)《三家詩拾遺》云：「三家《齊詩》存者絕少，《魯訓故傳》，亦復無多，唯《韓詩》亡於北宋。」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32，頁 918；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叢書集成初編》第 1744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嶺南遺書》本），卷首，〈凡例〉。

<sup>6</sup> 范處義，《詩補傳》，收入納蘭性德輯，《通志堂經解》第 8 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同治十二年 (1873) 富文齋刊本），卷首，〈明序篇〉，頁 8。

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sup>7</sup>

張揚此說者，以陳喬樞 (1809-1869)《三家詩遺說考·序》最具代表，云：

凡《荀子》書中說《詩》者，大都為魯訓所本。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為博士，……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業，所習當為《魯詩》。  
劉向父子，世習《魯詩》，……漢人傳經，最重家學，向世修其業，著《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其所稱述，必出於《魯詩》無疑矣。<sup>8</sup>

陳喬樞又以《荀子》說《詩》多為《魯詩》所本，據此以推，則《元王詩》亦當仿此。范處義以《荀子》為源，劉向為流，其所謂源流者，謂《魯詩》也。如此，則《荀子》得為《魯詩》之祖。汪中 (1744-1794)〈荀卿子通論〉據《漢書·楚元王傳》、《漢書·儒林傳》與《鹽鐵論》之記載，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證「《魯詩》，荀卿子之傳也」。<sup>9</sup> 所論並同。

姚振宗 (1842-1906)《漢書藝文志拾補》亦云：

《元王詩》在齊、魯、韓三家未分之前，固與申培公同為《魯詩》宗，後劉向家世《魯詩》，傳學至西京之末，皆元王一派，亦云盛矣。<sup>10</sup>

姚振宗據此以論元王家族實為西漢《魯詩》傳承之重要家族，而後代輯三家者如陳喬樞、范家相、王先謙 (1842-1917) 乃以此師承將劉向《詩》說歸入《魯詩》。<sup>11</sup> 此種鑑別家派之法，葉國良以為王氏所用之法乃「傳記稱某人習某《詩》，則其

<sup>7</sup> 王應麟，《詩攷》，《叢書集成初編》第 1727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津逮秘書》本），頁 128。

<sup>8</sup> 陳喬樞，《三家詩遺說考》，《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7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魯詩遺說考》，卷 1，頁 43。

<sup>9</sup> 汪中著，田漢雲點校，《新編汪中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頁 412。

<sup>10</sup> 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收入王承略、劉心明主編，《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第 2 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卷 1，頁 203。

<sup>11</sup> 參賀廣如，〈論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之定位〉，《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報》，28（桃園：2003），頁 92-93、113。

《詩》說即為某《詩》說」，<sup>12</sup> 賀廣如則將此法名為「師承法」。<sup>13</sup> 以元王從學《詩》者，乃荀子門人浮丘伯，然為《魯詩》者卻是與元王同學之申公，據此僅能得出劉向家世與《魯詩》關係密切，而不必然傳《魯詩》，亦不得以為元王所次《元王詩》亦屬《魯詩》。<sup>14</sup>

除師承法之運用外，亦有自用字論證劉向所序諸書之為《魯詩》者，然其間卻又多疑義。是以歸劉向入《魯詩》者，學術史中卻有大異此說者，如王引之(1766-1834)《經義述聞·毛詩》「劉向述韓詩」條據《列女傳》歸於《韓詩》，以駁王應麟《詩考》「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之說。王引之又據《列女傳·貞順傳》引《詩》之文合於《韓詩章句》、《賢明傳》合於《韓詩外傳》、《母儀傳》合於《禮記·坊記》鄭《注》引《韓詩》，又據《上災異封事》合於《文選注》所引《韓詩》，遂定「向所述者乃《韓詩》」。<sup>15</sup> 以師承法分割家派，其不可作為唯一依據者，從王引之《經義述聞》所論即可得知一二。且徐復觀(1904-1982)亦以為劉向著作大量吸納《韓詩傳》，則劉向《詩》學實受《韓詩傳》影響。<sup>16</sup> 葉國良舉阮元據南宋刻本《列女傳》為例，說明《列女傳》古本雖為南宋舊槧，但俗字頗多，絕非《魯》詩原文。<sup>17</sup> 《列女傳》是否列入《魯詩》，有時引《詩》版本上之差異，亦或使此說致疑。<sup>18</sup>

近年以來，從事劉向相關著作中之《詩》學考徵者，多有見地。黃梓勇論劉向《詩》學家法歸納前賢研究，有「魯詩說」、「韓詩說」、「兼習魯韓說」、「存疑說」與「兼採各家，不偏主一家說」等五類。<sup>19</sup> 一家之《詩》說，有歸於魯

<sup>12</sup> 葉國良，《經學側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詩》三家說之輯佚與鑑別〉，頁 83-84。

<sup>13</sup> 賀廣如，〈馮登府的三家《詩》輯佚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3（臺北：2003），頁 315。

<sup>14</sup> 張錦少云：「如果元王只是綴集申公《詩》傳，何以更號曰“元王詩”？元王深於《詩》，故以“元王詩”名，當有別於《魯詩》。而事實上西漢傳《詩》的并不止四家。」所論有理可從。張錦少，〈論清人三家《詩》分類理論中的“師承法”——以劉向及《說苑》為例〉，《嶺南學報》，4（香港：2015），頁 80。

<sup>15</sup> 王引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卷 7，頁 182。

<sup>16</sup>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 3 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劉向《新序》、《說苑》的研究〉，頁 48。

<sup>17</sup> 葉國良，《經學側論》，〈《詩》三家說之輯佚與鑑別〉，頁 109。

<sup>18</sup> 葉國良指出：「《詩》異文的收集，清儒除續有增補外，往往又利用異文的比較來作鑑別三家遺說的工作。……但由於同一本書，版本有異同，傳寫有訛誤，再加上古籍中異文往往只是假借，名為異文，義實無二，運用這種方法需要格外小心，將這些異文分別輯入三家，也需博考版本異同。」同前引。

<sup>19</sup> 黃梓勇，〈劉向《詩》學家法研究〉，《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2（長沙：2008），

者，有歸於韓者，亦有存疑折衷者，真可謂莫衷一是。則其說之兩可，頗無定準，令學者多有望洋歧途之失，一旦採取宋代以下劉向世守《魯詩》之說者，則對王引之等視為《韓詩》說與〈楚元王傳〉所載劉向〈條災異封事〉引《詩》兼有齊、韓二家之事實有所違礙。<sup>20</sup>

余嘉錫 (1884-1955)《四庫提要辨證》對此師承歸法之批評，頗中其的，其云：

夫以一人之學，尚自前後不同，本傳之說，尚復不可盡信；乃欲於數千載之後舉史傳所不載、昔人所未言，用揣測之詞，想當然之說，謂其祖學《魯詩》，其後世子孫亦必學《魯詩》，恐非所謂實事求是者也。故曰：謂向為學《魯詩》者，未必然也。自宋人之論劉向，開此法門，於是後人之輯三家詩者，更從而推廣之，大抵因父以及子，因師以及弟。以為漢人最重家法，不知皆無徵不信之說，難免於穿鑿傳會也。<sup>21</sup>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而經學漸大行於世，卻未曾在五經之下另立各家博士；及至漢宣帝石渠閣會議之後，始在各經之下分立各家博士，而其後乃有師法之分家。錢穆 (1895-1990) 云：「今考漢博士經學，分經分家而言『師法』，其事實始於昭、宣之後。」又云：「竊疑《詩》分齊、魯、韓三家，其說亦後起，故司馬遷為《史記》，尚無《齊詩》、《魯詩》、《韓詩》之名。」<sup>22</sup> 更云：

至班氏《漢書》則確謂之《魯詩》、《齊詩》、《韓詩》焉。是三家《詩》之派分，亦屬後起。申公、轅固生、韓生皆曾為博士，皆以《詩》教授，申公、轅生皆在文帝時。其時博士不限於經生，以通經為

頁 9-11。黃文所論，當承襲自馬瑜說法，而所論較馬文周全。馬瑜，〈從劉向著作引詩看劉向的《詩》學觀〉，《雁北師範學院學報》，22.1（大同：2006），頁 60-63。

<sup>20</sup> 如魏家川便承陳喬樞《魯詩遺說考》之說法，一味將劉向之說歸入《魯詩》，又引述劉向〈條災異封事〉之引《詩》，卻不辨〈條災異封事〉中《詩》說歧異。張立克亦多有申論，足見劉向〈條災異封事〉說《詩》之多元樣貌。魏家川，〈先秦兩漢的詩學嬗變：從“《詩》云”“子曰”到“子曰詩云”〉（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頁 294；張立克，〈劉向〈條災異封事〉用《詩》考論——劉向《詩》學觀念再探〉，《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錦州：2010），頁 80-85。

<sup>21</sup>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10，頁 557-558。

<sup>22</sup>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8 冊（臺北：聯經出版，1994），〈兩漢博士家法考〉，頁 211、215。

博士者，亦不限於專治一經，更無所謂師法家派，故知當時必尚無申公為《魯詩》，轅固生為《齊詩》，韓生為《韓詩》之別也。石渠議奏不及《詩》，是《詩》分三家，疑且在石渠後矣。<sup>23</sup>

錢穆之說，要點有二：其一，由《漢書》之記載可知齊、魯、韓之分後起，甚而可能在石渠閣會議之後，據此知申公、轅固生、韓生以《詩》為教，並未分家；其二，漢宣以前，無所謂師法家派，博士或經生通經，其學頗務寬廣而不限於專通一經。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亦云：「〈儒林傳〉載『由是某經有某家之學』，事皆晚出。可證其先諸家說經雖有異同，未分派別，不成家數。」<sup>24</sup> 則以楚元王世傳《詩》學專為魯、為韓之說，皆未必合於史實。

綜言之，西漢前、中期，分經分家既未興起，而通經之士亦不在固守，則以劉向家族世守《魯詩》或獨傳《韓詩》之說，在學術事實上無法成立。且〈漢志〉齊、魯、韓、毛四家之外，後世更有挖掘諸家之外者，如 1977 年於安徽阜陽出土之《阜詩》，<sup>25</sup> 與 1993 年江蘇東海尹灣所得〈神烏賦〉所引之《詩》，皆與習稱今、古四家有異。<sup>26</sup> 近世以來，簡牘出土雖以先秦為多，然亦不乏兩漢相關文獻，由近年出土文獻觀之，西漢典籍文獻在向、歆前後之情況，恐非整飭如今，即如《詩》之一經，亦多有與諸本相出入者，<sup>27</sup> 則西漢對於《詩》之分派壁壘，是否如後世所言之分明，恐不無疑義。

劉向《輯略》云：

《詩》始自魯申公，作古訓。燕人韓嬰為文帝博士，作《詩外傳》。齊人轅固生為景帝博士，亦作《詩外內傳》。由是有魯、韓、齊之學。<sup>28</sup>

<sup>23</sup> 同前引，頁 216。

<sup>24</sup> 同前引，頁 25。

<sup>25</sup> 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阜陽漢簡《詩經》簡論〉，頁 31。又參陳柏嘉，〈漢代「第五家《詩》」說獻疑〉，《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3（香港：2016），頁 29。

<sup>26</sup> 張濤，《經學與漢代社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頁 112。

<sup>27</sup> 邢義田整理漢邊出土經學文獻，其文頗有異於世所習傳之今古文者。相關舉例，見邢義田，《今塵集：卷一：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新北：聯經出版，2021），頁 164-180。又，漢代之相關材料可參蔣文，《先秦秦漢出土文獻與《詩經》文本的校勘和解讀》（上海：中西書局，2019），頁 5-6。

<sup>28</sup> 劉向、劉歆撰，姚振宗輯錄，鄧駿捷校補，《七略別錄佚文 七略佚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劉向分言齊、魯、韓之學，而未言其為「三家」，此《漢書·藝文志》「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卷 30，頁 1708）之所本。以錢穆之意而觀之，齊、魯、韓皆以《詩》教，而未有分家之別，僅是諸人對於《詩》之不同訓詁。以是言之，論劉向稱《詩》之說，但自三家立場區分以論其傳魯、傳韓，其事當已不可行。又以其書，舊頗云「劉向著」者，亦復有疑。案書題「劉向」者有三，分別為《新序》、《說苑》與《列女傳》，在漢成帝永始元年（16 B.C.），時劉向六十四歲。<sup>29</sup> 據姚振宗所輯《七略別錄佚文》之〈諸子略佚文〉，此三書分別言：

臣向所序《新序》三十篇。

臣向所序《說苑》二十篇。

臣向所序《列女傳》八篇。<sup>30</sup>

三條資料為劉向之直接史料，其所用之字俱為「序」。「序」者，當解為「序其次」之義。

關於《說苑》，〈諸子略〉云：

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sup>31</sup>

劉向既云「所校中書」，又云其文獻之況混淆謬亂，「難分別次序」，是故為之「以類相從」、「條別篇目」，此正「序」之意也。羅根澤據此云：「《新序》一書，〈敘錄〉久佚，無從考證。然〈說苑敘錄〉言『除去與《新序》復重者』云云，則《新序》亦當時已成之書，非劉向撰著。」<sup>32</sup> 其稱《說苑》、《列女傳》

社，2008），頁 14。

<sup>29</sup>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劉向歆父子年譜〉，頁 50。

<sup>30</sup> 劉向、劉歆，《七略別錄佚文 七略佚文》，頁 46、47、48。

<sup>31</sup> 同前引，頁 47。

<sup>32</sup> 羅根澤，《諸子考索》（香港：學林書店，1977），〈《新序》、《說苑》、《列女傳》不作始

書，亦本此義。

關於《列女傳》，〈諸子略〉則言：

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福禍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sup>33</sup>

是書與子劉歆 (c. 50 B.C.-23) 同校，依類相從，就其書之目的而言，乃在人事禍福榮辱與是非得失。此處又云「校」，校者，劉向云：

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sup>34</sup>

據此知向、歆父子《列女傳》之材料來源，非本於自撰，當是劉向校中祕書時所序次。是以前當已有《列女傳》之舊籍材料，而非新撰。朱曉海云：「向、歆父子校編時新增者恐有限，則是編實可視為先秦某些家派觀念、傳述、遺文的整合成果」，<sup>35</sup> 其說甚瑣。

據上所論〈七略〉佚文，其所從事與校《戰國策》之事相同。〈六藝略〉「《戰國策》三十三篇」：

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莠；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sup>36</sup>

正因祕書文獻乖舛錯亂，又以復重者頗多，劉向在哀帝時已陸續校書，此即《漢書·藝文志》所言：

〔哀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

於劉向考》，頁 540-541。

<sup>33</sup> 劉向、劉歆，《七略別錄佚文 七略佚文》，頁 48。

<sup>34</sup> 同前引，頁 19。

<sup>35</sup> 朱曉海，〈劉向《列女傳》文獻學課題述補〉，《臺大中文學報》，24（臺北：2006），頁 52。

<sup>36</sup> 劉向、劉歆，《七略別錄佚文 七略佚文》，頁 32。

意，錄而奏之。（卷 30，頁 1701）

劉向校書之事，時間橫跨近二十餘年，是中國文獻學史上極為重要之事件。其所從事，余嘉錫云：

古之經典，書于簡策，而編之以韋若絲，名之為篇。簡策厚重，不能過多。一書既分為若干篇，則各為之名，題之篇首，以為識別。<sup>37</sup>

又云：

夫篇卷不相聯屬，則易於凌雜，故流傳之本多非完書。又古書以一事為一篇者，往往每篇別行。及劉向校書，合中外之本，刪除重複，乃定著為若干篇。故每書必著篇目於前者，所以防散失免錯亂也。<sup>38</sup>

劉向校中祕書，就〈七略〉所陳之事觀之，皆可知《新序》、《說苑》、《列女傳》三書之文獻來源，乃就舊藏而董理條貫之，非屬自撰。

屈守元 (1913-2001) 在《說苑校證》之〈序言〉中，以為《說苑》乃「劉向校書時根據皇家所藏和民間流行的書冊資料加以選擇、整理的頗具故事性、多為對話體的雜著的類編」。<sup>39</sup> 屈守元更明確指出：

《說苑》（以及他所序的其他資料，包括《新序》、《列女傳》等）在某種程度上，他是把它當作「諫書」用的，陳古諷今，集腋成裘，當然就不限儒門一家之言了。<sup>40</sup>

《說苑》等書輯錄先秦以來之文獻材料，依類編定，故就其文獻性質而言實非新創。即便其中或有秦漢之事，朱曉海指出：當是「劉向未校前的原本『中』秘早有，當為漢武以前的故籍」、「至少是學術、文化斷代的先秦」，<sup>41</sup> 以文獻學觀

<sup>37</sup>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34。

<sup>38</sup> 同前引，頁 36。

<sup>39</sup> 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

<sup>40</sup> 同前引。

<sup>41</sup> 朱曉海，〈劉向《列女傳》文獻學課題述補〉，頁 55。

點而論，劉向所為在輯校、新編，而不在著為新書，當無可疑。《新序》之內容，亦復如是。<sup>42</sup>

劉向雖無注《詩》之書，然其《列女傳》、《說苑》、《新序》中，引《詩》高達二百五十多次，<sup>43</sup> 頻率之高，為兩漢罕見，是以論劉向引《詩》之問題者，此三書必然是討論之焦點。戴維《詩經研究史》論及「元王詩派」，謂創始者為楚元王，並以為與《魯詩》關係甚大，可視為其流派，元王詩派之後以劉向最著名。<sup>44</sup> 戴氏此說乃據《漢書·楚元王傳》立論。又云：

劉向對《詩經》的觀點，應該不全為《魯詩》派，而是雜了其他派別的觀點，甚至連作為《齊詩》派主要特徵的災眚之說也引用以解《詩》，難道《魯詩》派也有此傾向？<sup>45</sup>

戴維以為劉向三書不全為《魯詩》學派，卻又從其元王世系中論其為《魯詩》流派。蓋因其見《漢書·楚元王傳》劉向所上奏章頗染《齊詩》災異之說，故有此論。然戴維又以為「漢人最守家法」，而謂「劉向雖定為《魯詩》派，實則像他這樣博學而領校《五經秘書》，少學《穀梁》之人，肯定不會只守一家之言一家之詩的。」<sup>46</sup> 正因戴氏跳脫不出劉向家族世守《魯詩》之範圍，遂更有此「漢人最守家法」、「劉向不只守一家之言」等模稜兩可之說。田中和夫《漢唐詩經學研究》則云：

從《詩經》注釋史的立場來看，保留在《列女傳》中《詩經》句子注釋，與《詩經》的正統注釋和後世毛亨以為的所謂「三家詩」注釋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因而具有獨到的見解並為後代學者所推崇。<sup>47</sup>

<sup>42</sup> 相關說法參劉向編著，石光瑛校釋，陳新整理，《新序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7），〈整理說明〉，頁 2-4。

<sup>43</sup> 見劉毓慶、郭萬金，《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242。該書所作「劉向著作引《詩》、稱《詩》表」雖間有疏漏（如失收《說苑·君道》引〈大雅·天作〉），然詳盡可參。同前引，頁 252-321。

<sup>44</sup> 戴維，《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頁 59。

<sup>45</sup> 同前引，頁 64。

<sup>46</sup> 同前引。

<sup>47</sup> 田中和夫著，李寅生譯，《漢唐詩經學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頁 22。

田中和夫基本上仍將《列女傳》視為劉向之個人創作，而以為其中與四家《詩》說不同處，乃是劉向「保留了《詩經》的某些詩歌創作逸聞，但同時也保存了《詩經》以外的某些詩歌創作故事」，是以涉及《詩》說者，不乏「表現作者劉向《詩經》注釋觀」之處。<sup>48</sup>

劉向之不能純入《魯詩》，又或者不宜單從某家、某說論劉向之《詩》說，其間違礙略如上述。是以《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只宜從「編纂」角度論其《詩》說之多元面貌，而不宜從「新撰」以論。以《列女傳》一書為例，朱曉海考證此中詩說，多有「傳自先秦，非漢人嚮壁虛構」，<sup>49</sup> 既是傳自先秦，而劉向領校中祕書，則其所序次三書也便無家派問題，更遑論將其視為《魯詩》傳人。湯志鈞、錢杭指出：

在他分類纂輯先秦至漢初史事和傳說，並雜以議論，旨在闡明儒家政治思想和倫理的《說苑》一書中，凡明文徵引《春秋》經文之處，多雜采諸說，可見劉向並不墨守狹隘的學派藩籬。<sup>50</sup>

綜上所論，若欲觀測劉向《詩》說，當不能侷限於三家之分。徐興無指出，劉向、劉歆父子「二人之間又能互相辯難，皆是轉益多師，不拘家法的典型」，且「在劉向歆父子的經學活動中很難找到他們固定的經學傳承」，<sup>51</sup> 此說甚是通達。

### 三、劉向所序三書關涉之政治現實及其稱《詩》問題

劉向相關著作中，凡輯為專書者乃就皇家祕藏舊籍加以讎校序次而成，即上述所序《新序》、《說苑》、《列女傳》三書。劉向校書起於漢成帝河平三年（26 B.C.），即《漢書·成帝紀》所載「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卷 10，頁 3110）事也，時向五十歲；所序三書成於漢成帝永始元年（16 B.C.），時六十四歲。據《漢書·楚元王傳》云：

<sup>48</sup> 同前引，頁 22、32。

<sup>49</sup> 朱曉海，〈劉向《列女傳》文獻學課題述補〉，頁 56。

<sup>50</sup> 湯志鈞、錢杭，《兩漢經學與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291。

<sup>51</sup> 徐興無，《經緯成文——漢代經學的思想制度》（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石渠閣會議與漢代經學的變局〉，頁 45。

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卷36，頁1957-1958）

「向睹」所云諸事，非在一年間事，而係指劉向歷年所睹外戚之事。趙指漢成帝之后趙飛燕，衛為成帝時衛婕妤李平。成帝時重用其舅王莽，又厚趙氏家族，班固於《漢書·成帝紀·贊》云：

〔成帝〕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卷10，頁330）

「趙氏亂內，外家擅朝」所言正是外戚之事。成帝建始以後，王莽家族漸掌國政，終致篡漢。「由來者漸矣」雖為班固所發，然劉向真可謂「見微」。外戚干政，至關天子自身，劉向以為王政興廢，由內、近為始，實亦《詩三百》始於〈關雎〉之義。《列女傳》取《詩》、《書》之可以為女範者，以期天子興國家、遠孽嬖亂亡，故其書意在「戒天子」。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云：

《新序》、《說苑》據本傳言，則是採之傳記。……其中說《詩》之語，出於六國之時者，故無所謂齊、魯、韓、毛。即出於漢以後者，亦必各家都有，不守一先生之言。向之序此兩書，意在發明儒者之綱紀教化，以戒天子。<sup>52</sup>

據余嘉錫所論，《新序》、《說苑》說《詩》之語，出自六國之時，是以向序此二書之《詩》說，或同於齊、魯、韓、毛，或有出於四家之外者，近來學者所論，分類紛雜。<sup>53</sup> 然其用意，不在單純釋《詩》，而在戒天子。朱曉海以為《列女傳》

<sup>52</sup>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10，頁558-559。

<sup>53</sup> 黃梓勇，〈劉向《詩》學家法研究〉，頁9-11。

「事等王式『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實乃一特殊型態的諫書」，深得其要。<sup>54</sup> 唯《列女傳》所涉之事與後宮、外戚相關，而王式以《詩》諫昌邑王乃就其「以行淫亂廢」（卷 88，頁 3610），兩事不全同。然若以此觀點擴及《新序》、《說苑》兩書，亦不乏此「諫書」之意，如上引屈守元所言三書「當作『諫書』用」，其說當是。

西漢以來「通經致用」所及，皮錫瑞言「其學極精而有用」而「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篇》當諫書」，<sup>55</sup> 其中諫書云者，即謂王式。通經致用既允為一代之風尚所趨，則以《詩》為諫書者，當不限王式一人而已，特因以《詩》為諫書之典型者載在《漢書·王式傳》，最為人知。程元敏先生據《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所記王吉、龔遂以〈檜風·匪風〉與〈召南·甘棠〉諫昌邑王，以證「《三百篇》當諫書，非獨推王式」，<sup>56</sup> 甚合西漢《詩》學現實。由《詩》具有諫書性質之用而觀之，在劉向所序三書中表露無遺。正因劉向作為骨鯁之臣，耿介之諫臣本質，令其領校中書尤其留意「致王道」之盛世目的。然自宣帝時，年二十被擢為諫大夫以來，所見朝政亂象，令其不得不發出諫言，或外戚干政，或宦官掌權，以致忠良如蕭望之、周堪等人，無一善終，劉向始終未曾在政治核心之中，是以「被邊緣化的劉向只能扮演帝師和諫臣的角色」，無論上疏奏或序三書，「都可以算作諫書」。<sup>57</sup>

據前引《漢書·楚元王傳》載劉向序書之動機，以《列女傳》之編著動機最為顯豁，且與此書之本質相應。既云趙、衛起於微賤而逾禮制，進而言王政當由內、近而推及外、遠，則其所諫於帝者，其事甚明。《列女傳》序於漢成帝永始元年，此前，據本傳所載元、成二帝之政治背景，如下所述。

元帝初元年間 (48 B.C.-44 B.C.)：元帝初即位時蕭望之、周堪、金敞與劉向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卷 36，頁 1930）。元帝永光年間 (43 B.C.-39 B.C.)：蕭望之等以「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之罪，為奸佞所害（卷 36，頁 1932）。此涉外戚、宦官。

成帝河平年間 (28 B.C.-25 B.C.)：顯等伏辜，〈楚元王傳〉載「〔劉向〕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成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

<sup>54</sup> 朱曉海，〈劉向《列女傳》文獻學課題述補〉，頁 64。

<sup>55</sup> 皮錫瑞，《增註經學歷史》，頁 85。

<sup>56</sup> 程元敏，《漢經學史》（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頁 144。

<sup>57</sup> 徐興無，《劉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356。

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卷 36，頁 1949-1950）自此年起，外戚王氏漸秉國鈞。河平四年，成帝「方精於《詩》《書》」，劉向乃因《尚書·洪範》並集合春秋以來「符瑞災異之記」推演為〈洪範五行傳論〉，係「為鳳兄弟起此論」（卷 36，頁 1950）。則劉向著論之意甚明，實為外戚之事而作也，<sup>58</sup> 對王權下移以致王綱不振，指涉至明。<sup>59</sup> 成帝永始元年劉向上三書，「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劉向謂陳湯：「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盛】，其漸必危劉氏。」（卷 36，頁 1958）由元帝朝以至成帝朝，所面臨之政治危機，由原本之外戚干政、宦官亂權兩事，逐步形成外戚王氏壟斷王綱，以致君權旁落，則王道不彰之事實，顯而易見。

據上文所陳諸事，本傳所言《列女傳》之所以戒天子者，實有切用於事，是劉向所序三書中政治目的最為明確之書。既以「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作為纂輯動機以「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徵諸其書，〈諸子略佚文〉一作八篇、一作七篇，<sup>60</sup> 篇目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則「賢妃貞婦」實為《列女傳》之重心，意在正面之「興國顯家可法則」，七篇之中僅有一篇不在其列，僅〈孽嬖〉確屬「孽嬖亂亡」。檢《列女傳》首二卷為〈母儀〉、〈賢明〉，所收多為君主、大臣之妻妾與生母，如〈母儀〉之首為「有虞二妃」，云：「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其事蹟見載於《尚書·堯典》、《孟子·萬章》、《史記·五帝本紀》。傳又云：「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sup>61</sup> 所列以舜之二妃

<sup>58</sup> 金春峰指出：「劉向〈洪範五行傳論〉今佚，但《漢書·五行志》多有引用。……從〈五行志〉所引看來，劉向對《春秋》災異的分析，多直接影射女主擅權，外戚專政。」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增補第三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 405-406。

<sup>59</sup> 程蘇東指出：「在劉向的理論體系中，陰陽各有分職，故人臣不可妄擅君權，君主也應尊重大臣執事之權以及百姓利益；不過，西漢後期政局的核心問題在於王綱不振，權柄下移，故劉向在說解中復援《春秋》『尊尊』之義，強化『陰氣勝』的政治危害，反映出鮮明的現實指向。」程蘇東，〈劉向〈洪範〉五行學考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3.1（臺北：2022），頁 53。

<sup>60</sup> 劉向、劉歆，《七略別錄佚文 七略佚文》，頁 48。案：《漢書·楚元王傳》載為八篇，據《四庫全書總目》所論，今傳之本頗經改易，館臣云「今前七卷及頌題向名，〈續傳〉一卷則不署撰人，庶幾核其實而闕所疑焉」，然據朱曉海所考，劉向與劉歆「於鴻嘉年間著手校編，成七篇本，益以〈列女傳頌〉一篇，則為八篇」。本文從朱氏之說。參見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第 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卷 57，頁 1235-1236；朱曉海，〈劉向《列女傳》文獻學課題述補〉，頁 73。

<sup>61</sup> 王照圓，《列女傳補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51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為首，言其德純行篤，引〈周頌·烈文〉以讚其能為人範式，且又頌曰：「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舜於下。以尊事卑，終能勞苦。瞽叟和寧，卒享福祐。」<sup>62</sup> 正強調后妃之德，能和寧帝王之家。是以《列女傳》所載之女，無不以德為先，首列「有虞二妃」頗有《詩》始〈關雎〉之義。以此觀之，劉向序次《列女傳》雖在「戒天子」，朱曉海以為「編者原初預設更重要的乃一位讀者：天子」，<sup>63</sup> 則其作為諫書之用，實在正向之勸勉。

元帝即位之初，劉向以「宗室忠直，明經有行」為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所薦，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卷 36，頁 1929）。然元帝即位以來，災異屢生，彼時儒生如翼奉、京房、谷永等，莫不藉機上奏。翼奉（生卒年不詳）向以災異言《詩》，是以奏上元帝，所陳天地災異之象以責人間政事得失。《漢書·翼奉傳》云：

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卷 75，頁 3173）

翼奉以為災異之變，元凶在舅后之家滿朝，且僭越過度，與漢惠之呂氏、宣帝之霍氏舊事同，由此導致陰氣盛行，故災異頻生。同一事而翼奉歸責外戚，京房（77 B.C.-37 B.C.）則究於宦官。元帝初元二年，中書令石顯專權，一時治世能臣或貶出，或自殺，《漢書·京房傳》載中書令石顯專擅，與尚書令五鹿充宗相善，頗見用於元帝。京房言於元帝曰：

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靄，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卷 75，頁 3162）

且將此災元凶，直指宦官石顯。據此諸事可知，元帝承宣帝之弊，弊在外戚與宦官，楊向奎視此為「元帝一朝的致命傷」，<sup>64</sup> 至為確切。元帝一朝，事實上能臣輩出，上所言蕭望之、周堪等，志與劉向同，對政治革新之企望，銳而不已，而宦

卷 1，頁 665。

<sup>62</sup> 同前引。

<sup>63</sup> 朱曉海，〈劉向《列女傳》文獻學課題述補〉，頁 59。

<sup>64</sup> 楊向奎，《西漢經學與政治》（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頁 77。

官、外戚實乃最大障礙。卻由於元帝立場不明，激化能臣與宦官、外戚間之對立，終致蕭望之自殺。<sup>65</sup>

劉向的著作中，最能反映其所面臨之政治難題者，實為《列女傳》，其所針對之難題顯為外戚。與《列女傳》不同者，《說苑》、《新序》「戒天子」之對象，幾乎遍及作為明君所當奉行之事，而非專對某事。《漢書·楚元王傳》但云「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即便〈諸子略佚文〉所述，除編次之事外，涉及內容者僅云「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則知其書並非為特定問題而發。劉向所序《列女傳》及所上諸疏奏固有此意，然以此觀點推諸《新序》、《說苑》二書亦必有此意，實則不確。<sup>66</sup> 二書之中偶有相關論述，如《新序·雜事》載：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sup>67</sup>

其事雖與《列女傳》用意同，卻僅是二十篇之一，不宜將其過度放大。

今檢兩書篇目：《新序》有〈雜事〉、〈刺奢〉、〈節士〉、〈善謀〉，《說苑》則為〈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敬慎〉、〈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武〉、〈叢談〉、〈雜言〉、〈辨物〉、〈修文〉、〈反質〉。《新序》諸篇，除〈雜事〉無特定指涉外，它篇皆以事為類；而《說苑》除〈君道〉篇外，餘十九篇篇首皆有劉向之總論。徐復觀云：「其篇題由〈君道〉而至〈反質〉，反映出劉向的時代，並組成一個思想系統，此已可見其經營構造的苦心。」<sup>68</sup> 由此兩書篇目而觀，上至為君下至士人，大抵王道之法式皆在其中。徐

<sup>65</sup> 說參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 398-399。

<sup>66</sup> 如王啟敏言：「反對外戚用事的努力幾乎伴劉向一生。《新序》、《說苑》二書的創作與之也有一定的關聯。」又據《說苑·權謀》引霍光遺事，云：「《新序》、《說苑》重以史為鑒，但對本朝的事，主要使用影指的方法，很少直接表達意見。」據此強化兩書批判外戚之用意，然此等事例幾為兩書孤證。王氏之說，實非的論。王啟敏，《劉向《新序》、《說苑》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87、88。

<sup>67</sup> 劉向編著，《新序校釋》，卷 1，頁 27-36。

<sup>68</sup>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 3 卷，〈劉向《新序》、《說苑》的研究〉，頁 41。

興無云：

漢人恰恰又面臨六經殘缺、經師一人不能獨盡其經，因而數家之言並行、章句傳記紛呈的局面，所以漢人一定要盡可能毫無遺留地從殘存的六經和各家之學中網羅、拼貼，恢復出王道的全體面貌。<sup>69</sup>

劉向所務之事，正是如此。無論《列女傳》或者《新序》、《說苑》，極多本事皆重見先秦典籍。然《新序》、《說苑》篇目內容所呈現者並非特指某事件，真正涉及特定事件者實為《列女傳》。徐復觀又以為《新序》、《說苑》「採傳記行事」之性質「是直接受到韓嬰《詩傳》的影響」，<sup>70</sup> 而劉向在元帝永光四年，「依興古事」著〈疾廬〉、〈摘要〉、〈救危〉、〈世頌〉等八篇（卷 36，頁 1948），亦與《韓詩傳》同，皆「戰國中期以後，受孔子作《春秋》之影響，成為表達思想方式之另一方式。」<sup>71</sup> 檢《韓詩外傳》之文獻形式，先述故事，再證以《詩》之文辭，就此而言，劉向所序三書頗與相似，且就內容而言，兩者間之若干文獻頗有同者，徐復觀即指出劉向所序三書引《詩》現象當受《韓詩外傳》影響。<sup>72</sup> 至於其引《詩》目的是否可等論之，則宜辨清。

漢宣帝時因其祖父衛太子雅好《穀梁春秋》，是以即位後特重此傳，且為提高其地位而召開石渠閣會議，《春秋》本僅《公羊》一家，此後又增《穀梁》。劉向早年即親歷其中，傳載「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卷 36，頁 1929），據此知劉向之於《春秋》，素習《穀梁》，則其學術本身之有《春秋》背景亦可知。而其引《詩》是否受《韓詩傳》影響，則未必如此。余嘉錫云二書「與韓嬰作外採傳記以釋《詩》者，用意不同」，<sup>73</sup> 實劉向有「戒天子」之用意，而《韓詩傳》卻未必然也。

《說苑·建本》云：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畸，始不盛者終

<sup>69</sup> 徐興無，《經緯成文》，〈「王者之迹」與「天地之心」〉，頁 45。

<sup>70</sup>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 3 卷，〈劉向《新序》、《說苑》的研究〉，頁 39。

<sup>71</sup> 同前引，頁 41；〈《韓詩外傳》的研究〉，頁 1-4。

<sup>72</sup> 同前引，〈劉向《新序》、《說苑》的研究〉，頁 48。案：從「體例形式」觀點論《韓詩外傳》對劉向所序三書之影響，惠承匿名審查先生賜教，謹致謝忱。

<sup>73</sup>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 10，頁 558-559。

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sup>74</sup>

《說苑》除〈君道〉之外，每篇篇首之總論皆可視為劉向對此篇意旨之整體說明。<sup>75</sup> 此段釋〈建本〉篇旨，頗可見劉向學術背景之展現。劉向既學《穀梁》，又以楚元王後之《詩》學家族，且傳載「歆及向始皆治《易》」（卷 36，頁 1967），則此文引孔子之語、<sup>76</sup> 〈小雅·黍苗〉與《易》，且引《春秋》之義，全是其本身所具之學術涵養，則其引《詩》說事、依興古事乃其學術歷程本具之條件。《說苑·建本》又云：

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sup>77</sup>

此諸語略又見於《荀子》、《尸子》與《大戴禮記》，三書皆有〈勸學〉之篇，而其文字、思想有其相近之處，向宗魯云：「《尸子》、《荀子》皆《穀梁》先師。」<sup>78</sup> 《尸子》一書，問題較為雜繞，茲不俱論。<sup>79</sup> 而《穀梁》傳承本與荀子至為相關，《漢書·儒林傳》載「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卷 88，頁 3608），又云「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卷 88，頁 3617），且元王與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浮丘伯乃荀子門人，是《穀梁》之傳承與元王、劉向家族之學術傳承，本與荀子有源流之關係。則劉向所序三書之引《詩》內涵、形式，其所傳承當與《荀子》相關。

徐復觀又指出《詩》是劉向《新序》、《說苑》兩書引用最多之經典，乃受

<sup>74</sup> 劉向，《說苑校證》，卷 3，頁 56。

<sup>75</sup> 〈君道〉篇無總論，徐復觀認為或與此書之所以諫說帝王有關。說參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 3 卷，〈劉向《新序》、《說苑》的研究〉，頁 41。

<sup>76</sup> 《論語·學而》所載為有子語。

<sup>77</sup> 劉向，《說苑校證》，卷 3，頁 65。

<sup>78</sup> 同前引。

<sup>79</sup> 相關問題見：汪繼培輯，魏代富疏證，《尸子疏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整理說明〉，頁 1-9；〈尸子疏證序〉，頁 1。

《韓詩傳》影響。<sup>80</sup> 劉毓慶、郭萬金則進一步統計出《列女傳》、《新序》、《說苑》引《詩》達兩百五十餘次，係兩漢學者著作中引《詩》最多者。<sup>81</sup> 何以如此？是否必然受《韓詩傳》影響，或可略作討論。

《詩》在春秋本具諷諫之用，孔子或云「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左傳》、《國語》中除用於外交辭令外，亦不乏用於政治上之議政、勸諫之功能，<sup>82</sup> 是以《詩》之可以勸諫，春秋以來已多如此。徐復觀以為兩書所引典籍以《詩》之頻率最高，實受《韓詩傳》影響，雖有其理，然若將劉向三書引《詩》之諫書用法，本為劉向基於諫官本分而對春秋以來以《詩》勸諫傳統之繼承，不僅合於其學術養成歷程，亦符合此三書之本質。元帝永光元年，劉向曾上封事云：

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卷 36，頁 1942）

劉向此上封事所欲針對者乃災異現象，由此文可知詩人之美刺，與《春秋》所記災異結合，而此正「諫言」之務。在《漢書·楚元王傳》中所載，劉向上諫次數頗多，徐興無稱之為「最後的諫臣」，且謂：

自河平年間校書直到他逝世的十八年中，他都以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著精神進諫不已，疏奏屢上。除了這些疏奏之外，他的〈五行傳論〉、《列女傳》、《說苑》、《新序》甚至在校書時上奏的每一篇書錄，都可以算作諫書。<sup>83</sup>

徐氏之說，可說是掌握住劉向所序三書之重要目的，亦深副其諫官本色。

上述《列女傳》、《說苑》、《新序》引《詩》，實不宜視為劉向對《詩》文之詮釋與見解。書中所述屬先秦舊事，而彼時災異之說未興，是以引《詩》所論諸事，幾不見類於《齊詩》之身影，頗與本傳所載劉向疏奏異趣。劉向所輯諸書，保

<sup>80</sup>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 3 卷，〈劉向《新序》、《說苑》的研究〉，頁 48。

<sup>81</sup> 劉毓慶、郭萬金，《從文學到經學》，頁 242。

<sup>82</sup> 參曾小夢，《先秦典籍引《詩》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 47-50、95-100。

<sup>83</sup> 徐興無，《劉向評傳》，頁 356。

留先秦風尚，劉毓慶、郭萬金謂三書「保存了不少先秦及西漢早期的《詩》學資料」、「因而在他的思考與價值追求中，較多地保持了先秦儒家民本的思想和先秦士人的獨立精神」，<sup>84</sup> 大致可從。

#### 四、《漢書·楚元王傳》所載劉向疏奏引《詩》考論

三書之外，唯《漢書·楚元王傳》所載劉向歷年所上疏奏之引《詩》，可確視為劉向本人之《詩》學觀點。而其所論，結合災異，近於《齊詩》風格，卻大異於所序三書之引《詩》。

據《漢書·楚元王傳》所記載與劉向相關之著述，依其先後，計有：<sup>85</sup>

1. 元帝初元二年 (49 B.C.)，上變事。(卷 36，頁 1930)
2. 元帝永光元年 (43 B.C.)，上封事言災異。(卷 36，頁 1932)
3. 元帝永光四年，著〈疾廬〉、〈摘要〉、〈救危〉、〈世頌〉。(卷 36，頁 1948)
4. 成帝河平三年 (26 B.C.)，著〈洪範五行傳論〉。(卷 36，頁 1950)
5. 成帝陽朔二年 (23 B.C.)，上封事論王氏。(卷 36，頁 1958)
6. 成帝永始元年 (16 B.C.)，上疏諫起延陵。(卷 36，頁 1950)
7. 成帝永始元年，著《新序》、《說苑》，序次《列女傳》。(卷 36，頁 1957)
8. 成帝元延三年 (10 B.C.)，上奏論災異。(卷 36，頁 1963)

據傳記彙整出上列八條文獻資料。第 3 條所列四文已佚，第 7 條所列《新序》、《說苑》與《列女傳》三書，甚多引《詩》材料，唯此類文獻非屬劉向新著，其它六條資料，涉及稱《詩》文獻者為第 2、6、8 條，此文獻皆可直接視為劉向著作，是瞭解其《詩》學觀點最重要之文獻。本節爰基此意，針對此三條文獻所涉《詩》文，進行討論。

##### (一)元帝永光元年，上封事言災異

《漢書·楚元王傳》載，元帝即位初年，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受宣帝遺詔輔

<sup>84</sup> 劉毓慶、郭萬金，《從文學到經學》，頁 252。

<sup>85</sup> 案：此處劉向著作繫年，依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說。

政，更薦劉向、金敞，「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初元元年，「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冬，地震」（卷 36，頁 1929-1930），本傳記載，劉向以此諸災異與外戚許伯、史高干政、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有關，乃因之上書言變事，以為「地大震」、「殆為恭等」所致（卷 36，頁 1931）。書奏之後，弘恭、石顯又以讒言劾劉向等，遂致蕭望之貶官，後自殺，劉向下獄後貶為庶人。其後漢元帝拔擢周堪與弟子張猛，永光元年劉向「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卷 36，頁 1932）。劉向自言此封事之起因，謂：

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咄咄，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卷 36，頁 1932）

自元帝初即位，以至此年，劉向政治經歷所遭遇政治事件主要為忠臣罷退貶死，而外戚、宦官頻頻干政。此數年中，或地震，或星象異變，劉向乃將諸災異比附，以為與外戚、宦官亂政相關，是以言：「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劾）【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卷 36，頁 1947）此文係劉向傳中第一長文，遍引《易》、《詩》、《春秋》三經，深合其學術背景，且扣合帝舜以下歷史政事與災異變化，向元帝進行諫說。其引《詩》依次有〈周頌·清廟〉、〈周頌·雝〉、〈周頌·執競〉、〈周頌·思文〉、〈小雅·小旻〉、〈小雅·十月之交〉、〈小雅·正月〉、〈小雅·角弓〉、〈邶風·柏舟〉等九篇，以下將一一討論所引《詩》文所涉解讀與用意；其後又有直論當朝是非，並於下文申論之。

#### 1. 四方相和，天應於上

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粢。」釐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卷 36，頁 1933）

案：此段開頭有「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帝舜任命諸臣相讓之事，見於《尚書·堯典》。劉向此段，起於帝舜、中經西周文、武王與周公，總結云：「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為〈周頌·清廟〉。《毛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sup>86</sup> 據此，則〈清廟〉為周公率領諸侯在洛邑落成之後，祭祀文王，而詩人歌詠其事。王褒〈四子講德論〉云：「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蔡邕〈獨斷〉云：「〈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sup>87</sup> 王、蔡之說，王先謙以為是《魯詩》，《毛序》說同，是此詩詩旨，西漢並無異說。劉向申述此詩，以為在文王過世之後，周公歌詠文王之德而作此詩，顏師古《漢書注》云：

言文王有清靜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卷 36，頁 1934）

顏說本於《傳》、《箋》，與劉向之用意並無不同。據此可知，劉向引此詩之本意，在於強調周初君臣相和之政治情景，彼時君臣皆能紹承文王之德，王朝內外上下歡和。文王之後，周武王、周公秉文王之德而致天下安和，劉向引〈周頌·雝〉「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以言周王朝「四方皆以和來」。劉向引作「雍雍」，《毛詩》作「雝雝」，乃異體關係，其義無別。據劉向所引之義，此詩《毛序》謂「禘太祖」，太祖為文王，孔穎達申說詩義以為「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太祖」，<sup>88</sup> 顏師古《漢書注》承此說云：

此〈周頌〉禘太祖之〈雝〉詩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也）【止】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卷 36，頁 1934）

顏師古既釋詩，也釋《漢書》引《詩》。《漢書·韋玄成傳》玄成等所上奏議亦引

<sup>86</sup>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 19 之 1，頁 706。

<sup>87</sup> 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24，頁 999。

<sup>88</sup> 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注疏》，卷 19 之 3，頁 734。

此詩，且云：「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又云：「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卷 73，頁 3116）則兩傳所引之詩義，皆主於朝廷上下、君臣相合之義。

上述劉向所引〈周頌·清廟〉與〈周頌·雝〉兩詩，西漢諸家在詩義解讀上並無歧異，皆強調王朝政治所現君臣、四方相和。詩皆西周初期之頌詩，旨在陳述祭祀時繼位之天子能秉承先王之教，而使天下相和，劉向所云「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即此義也。四方和於下，而天必有所應，劉向遂又引〈周頌·執競〉、〈周頌·思文〉之文。〈周頌·執競〉《毛序》謂「祀武王」，<sup>89</sup> 此詩詩旨諸家無異說，<sup>90</sup> 則此詩當可通釋為「祭武王則武王降福」。<sup>91</sup> 〈周頌·思文〉《毛序》謂「后稷配天」，<sup>92</sup> 西漢諸家無異說，唯祭祀者為何，既在〈周頌〉則是西周，《漢書·郊祀志》云：「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卷 25，頁 1193）則祭祀者為周公、成王。「飴我釐粢」，《毛詩》作「貽我來牟」，<sup>93</sup> 用字上雖有差異，大抵是正借關係，訓詁上並無歧異。郊祀后稷而云「飴我釐粢」，此義當與〈執競〉「降福穰穰」用意相同，皆是祭祀者向祭祀對象祈福之意，實與「天人相應」無關，即便在慣以災異說《詩》之《齊詩》遺說中，亦是如此。而劉向乃節引兩詩文句，置於「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之脈絡中，顯與《詩》之原意脫離，明是斷章取義，而非今、古文異說之別。此節所論可分兩段，前段為〈周頌·清廟〉與〈周頌·雝〉之討論，可知劉向稱《詩》，意在勸說元帝君臣之間相和之要，此即「諸侯和於下」；後段〈周頌·執競〉、〈周頌·思文〉之文，用意強調為政以和之結果，天將有所相應，此即「天應報於上」。兩者相輔則「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 2. 朝廷不和，天地示警

劉向在敘述西周初期和樂之世之後，以下即述西周之末，其文頗長，以下謹依其引詩要義分為兩段，並標記《詩》篇目。

<sup>89</sup> 同前引，卷 19 之 2，頁 720。

<sup>90</sup>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 24，頁 1015。

<sup>91</sup> 此王先謙說。同前引，頁 1016。

<sup>92</sup> 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注疏》，卷 19 之 2，頁 721。

<sup>93</sup> 同前引。

## (1) 朝廷不和於下

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小雅·角弓〉）

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小雅·小旻〉）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替替！」（〈小雅·十月之交〉）（卷 36，頁 1934-1935）

## (2) 災異示警於天地

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小雅·十月之交〉）

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小雅·十月之交〉）

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小雅·正月〉）（卷 36，頁 1935）

此大段總結云：「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卷 36，頁 1935）賢與不肖之易位，意指賢者退位而小人仕進，以致朝廷不和。劉向始論幽厲之際乃西周末葉，周厲王、共和之後，宣王雖復中興，然周祚終亡於幽王之世。自厲王以迄幽王百餘年間，以厲、幽二王主政最為史書譏刺。〈小雅·角弓〉《詩序》云：「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sup>94</sup> 王先謙所輯，在《詩序》之外僅有劉向之說，又因王氏以劉向為《魯詩》，故以王氏之意，今文三

<sup>94</sup> 同前引，卷 15 之 1，頁 503。

家所見僅此。比較《詩序》與劉向之說，《詩序》明言幽王，而劉向言幽厲之際；就作者而言，《詩序》言父兄，劉向言詩人；就詩意而言，「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蓋指朝臣之間，因彼此不和而相怨也。若此，劉向之說解與《詩序》並無二致。

劉向又述幽厲之時，「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引〈小旻〉之詩以論之。《詩序》云：「大夫刺幽王。」<sup>95</sup>他家詩義未詳。至於所引詩句「歛歛」，劉向解為「相是」，有相合朋比之義，意謂「背正黨邪，翕然同聲，不顧是非」，<sup>96</sup>故小人在位，則其所為「相是」者，當指群小朋比為奸，相以為是而與君子相背。此解與《毛傳》「滄滄然患其上」異訓，<sup>97</sup>而「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一段之解，則無大異，意為：所謀者為善，彼等小人無不違背；所謀者不善，彼等皆奉行。據此知劉向引幽王時之〈小旻〉，意在批判朝廷上小人朋比為奸而與君子對立。

君子處於朝廷，堅貞自守而不違背原則，一以王事為務，卻反招致小人讒邪。劉向引〈小雅·十月之交〉「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咻咻」為說。《詩序》云「大夫刺幽王」，<sup>98</sup>顏師古本此說以解《漢書》此傳（卷 36，頁 1936）。《毛詩》作「黽勉」，與劉向所引「密勿」，雙聲之字形體不一；至於罪與辜、咻與讒，俱為用字不同，意義無別。故劉向引〈十月之交〉之用意，蓋在批評：君子勉勵於王事，不敢自陳辛苦，亦無過失，卻反招致小人眾口讒言。

上述一小節劉向申述之目的，旨在援引古事及其對應詩歌，以達到借古諷今之用意。所引諸《詩》皆與所述歷史時代相關，頗有詩史互證以強化諷勸元帝之企圖。劉向所引之事，重點在述說朝廷不和源於小人在位以排擊君子，終致朝政混亂。故下半段所論，即從災異示警角度，強化勸諫目的。在申述朝廷不和之後，劉向旋云幽厲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是則謂日蝕、月蝕乃上天示警，所〈十月之交〉之文，意謂周幽王六年之時，十月時日月交會之辛丑日，前有月蝕、今又日蝕，異象頻見，對百姓已是極大之悲哀。而詩中又將日月之凶兆源於天地運行失其常軌，與周朝政治無道源於不用賢人之事相比附。劉向乃藉詩義強化「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而使天地失序，遂又引同詩所言之地震而致地貌丕變，以明示警

<sup>95</sup> 同前引，卷 12 之 2，頁 412。

<sup>96</sup>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 17，頁 688。

<sup>97</sup> 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注疏》，卷 12 之 2，頁 412。

<sup>98</sup> 同前引，頁 405。

之意。據《國語》記載，周幽王時「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sup>99</sup> 可知〈十月之交〉詩人所寫諸事，俱屬事實，而詩中所言「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諸事，正合劉向以災異上封事於元帝之目的，又與〈楚元王傳〉中所記比年發生地震諸事相似。如此，幽王時代之事與〈十月之交〉所載，俱與劉向所處之背景相似，是以此年上元帝封事以言災異，《詩》中唯有〈十月之交〉最合此種情境，因而所引比重最高。且〈十月之交〉原詩明指八凶，而以「皇父卿士」為首，《漢書·五行志》云：

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  
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  
(卷 27, 頁 1494)

顏師古《注》云：「詩人刺王淫於色，故皇父之徒皆用后寵而處職位，不以德選也。」(卷 27, 頁 1495)《漢書·李尋傳》亦引此詩云：

此《詩》所謂「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卷 75, 頁 3189)

《漢書》引〈十月之交〉者頗多，蓋以此詩多言地震、日月蝕等天地異象，且扣合人事。是以《漢書》志、傳，皆將其指為外親大臣或中書宦官所致。故劉向引《詩》以論，實切中時弊，使《詩》所具諫書之功能得到強化。

劉向又言不以其時而霜降，引〈小雅·正月〉「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之詩。《詩序》以為「大夫刺幽王」，<sup>100</sup> 西漢諸家並無異說。<sup>101</sup> 「民之訛言」意指人民是非不辨之語，其勢頗大，足以陷人於險。推劉向之意，蓋藉以批判小人在位且以讒言相陷。

以上兩大段所申，劉向扣住時代背景與史事，所論史事有正面、有負面，論正面者蓋欲以勉元帝，論負面者，則不無藉古諷今之意味。劉向論列古事，正、反申述，其關鍵之字在於「和」與「不和」，不和之因乃在「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以

<sup>99</sup>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1，〈周語上〉，頁 26-27。

<sup>100</sup> 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注疏》，卷 12 之 1，頁 397。

<sup>101</sup>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 17，頁 665。

上文所論與劉向處境言之，其所針砭者乃在外戚與宦官兩事。且又總結云：「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卷 36，頁 1941）

據此段所述，天地異象之變與引《詩》結合，以諫天子，非唯《齊詩》學者如翼奉等如此，即劉向亦不乏相似意見。是亦可見劉向之《詩》說，實非一家之所可籠罩。

### 3. 統論政局，君子有守

上述兩段要點，從歷史發展，扣合災異與人事之關係，且據《詩》以論，以強化論證基礎。此小段引《詩》要點，則不在一時一地之史事，也不在災異與政治之關聯，而是回歸人事，就人事之是非與道德之良窳以論。劉向云：

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麇麇，見晁聿消」，與《易》同義。（卷 36，頁 1943）

此處所引，與上文所論雖同為〈小雅·角弓〉，然已不強調其歷史背景，而在通論政局是非。《毛詩·小雅·角弓》作「雨雪漙漙，見晁曰消」，<sup>102</sup> 其義無別，皆謂盛雪因日而消融，為否極泰來之義。顏師古《注》云：

言雨雪之盛麇麇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卷 36，頁 1944）

劉向又歷數古事，就君子之抉擇立場以論，云：

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sup>102</sup> 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注疏》，卷 15 之 1，頁 505。

言守善篤也。（卷 36，頁 1943）

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卷 36，頁 1945）

〈邶風·柏舟〉《詩序》云：「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sup>103</sup> 就《毛詩》之立場而解，此詩為衛國君子所作，因其「愠於群小」，而君子心堅如石，無以改易。然就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所引諸家而觀，所引魯說「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云云，<sup>104</sup> 顯非劉向引《詩》之意。據此亦可見，劉向引〈邶風·柏舟〉之用意，與《詩序》相合而與《魯詩》異，亦可見劉向非拘守於《魯詩》者。〈柏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毛傳》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sup>105</sup> 正合劉向「堅固而不移」之意。又「憂心悄悄，愠於群小」，與孔子諸人所遭遇之心志合轍。此詩係劉向相關著作中稱引最多者，皆稱引「我心」數句，分別見於《新序·節士》兩見、《說苑·立節》、《列女傳·貞順》「衛宗二順」與《列女傳》之〈衛宣夫人〉。其中以〈衛宣夫人〉中謂其作〈柏舟〉之詩，<sup>106</sup> 與其它篇引此論事者異。

## (二)成帝永始元年，上疏諫起延陵

據《漢書·成帝紀》：

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卷 10，頁 320）

<sup>103</sup> 同前引，卷 2 之 1，頁 74。

<sup>104</sup>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 3 上，頁 126。

<sup>105</sup> 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注疏》，卷 2 之 1，頁 74。

<sup>106</sup> 王照圓，《列女傳補注》，卷 4，頁 697。

成帝始以延陵為初陵，數年未成，後又聽從大匠解萬年之議，更營昌陵，亦未成。天下百姓虛耗疲勞頗甚，成帝乃復營延陵，而制度泰奢，劉向乃上疏以諫成帝。<sup>107</sup>此疏主於薄葬，頗費筆墨，以為：「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卷 36，頁 1955）葬愈奢厚則後世盜之掘之者愈速，是凶非吉，劉向以墓制薄厚所遭遇之可能景象，申述宜薄不厚。又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卷 36，頁 1955）〈斯干〉一詩，《詩序》云：「宣王考室也。」<sup>108</sup>《毛詩正義》引王肅（195-256），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sup>109</sup>而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除劉向之說外，所引諸家，皆主美宣王之儉。<sup>110</sup>是知諸家之說，並無歧互。〈斯干〉一詩言建築形制，皆極簡要，而強調宮室與君子居處之安寧，劉向言「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論〈斯干〉，用意當在以西周中興之君，諫成帝營建帝陵，宜儉不宜奢。

### (三)成帝元延三年，上奏論災異

成帝元延年間，「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劉向上奏言災異。開篇即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卷 36，頁 1963）

帝舜戒伯禹，事見《尚書·皋陶謨》；周公戒成王，則在《尚書·無逸》中。劉向引《尚書》，旨在勸戒帝王宜自警惕；其引《詩》之語，自陳「湯以桀為戒」。〈大雅·蕩〉《詩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sup>111</sup>此詩詩旨諸家無異說。〈蕩〉詩以周文王之口吻，數殷

<sup>107</sup> 說參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劉向歆父子年譜〉，頁 49。

<sup>108</sup> 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注疏》，卷 11 之 2，頁 383。

<sup>109</sup> 同前引，頁 384。

<sup>110</sup>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 16，頁 648。

<sup>111</sup> 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注疏》，卷 18 之 1，頁 641。

商之罪惡，以言周人得天下之正。<sup>112</sup> 劉向所引，見於詩之末章：「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大意为：樹木之敗倒，枝葉未有病害，其敗自根而起，商之借鏡，就在夏后之世。劉向引此詩論湯以夏桀為戒，故能成為聖帝明王。此年劉向上奏，自敘漢以來災異之變，以諫戒成帝。

成帝元延三年，上奏論災異，此奏之後，傳文云：

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卷 36，頁 1966）

成帝年間，外戚之患逐步成為主要之政治現實，與元帝一朝之宦官、外戚兩禍並見之情況，頗有不同。

是以劉向上成帝之疏奏，除諫起延陵一事之外，所評議之人禍，皆將災異與引《詩》相扣合，以強化勸諫目的。據本節所論，可知劉向上書，幾乎篇篇扣合時事政事，有為而發，具諫書功能，且言《詩》多涉史事與《春秋》，可視為詩、史互涉，亦可見劉向之學術背景對於疏奏議論之影響。其次，《詩》三百之於漢儒，其重要功能與意義，即是「以《詩》為諫提供歷史依據」。<sup>113</sup> 最與劉向所序《列女傳》、《新序》、《說苑》三書不同者，在於劉向疏奏引《詩》具有災異性質，可見非獨《齊詩》為然，亦可據此知見：若單將劉向《詩》說歸入《韓詩》或《魯詩》，必然無法合理說明此處現象。此種將災異與經義結合而勸諫天子，實可視為西漢經學學者「限制君權」之法，<sup>114</sup> 兩漢學者之所以如此，實與漢武帝之後君權之極度擴張有關。<sup>115</sup> 儒者單以仁義之說勸諫天子，未必能達致「戒天子」之目

<sup>112</sup> 說參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1983），頁 512。

<sup>113</sup> 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 2 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漢代齊、魯、韓、毛四家詩學〉，頁 151。

<sup>114</sup> 孫筱云：「漢代經學講求的天人合一，本於天人感應、天人相動，來源於民間迷信文化。漢代經師經過整理民間迷信的思想，創造出天人合一的概念，其真實目的在於提煉瑞祥說與災異說，並借以對被他們無窮放大的君權予以限制。」孫筱，《兩漢經學與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316。

<sup>115</sup> 相關論述，參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 1 卷，〈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官制演變〉，頁 133-137；第 3 卷，〈論史記〉，頁 192-193。

的，故佐以陰陽災異之說，以遂其意。<sup>116</sup> 除積極肯定君主之身分尊貴以致其作為與天地運行相應外；亦由另一面論天地異象示警以要求帝王自我省察。故上述劉向疏奏或從正面之勸勉，或反面之勸戒，申說作為帝王之自我行事當有所依準。西漢經師引經論證，往往扣合災異，是其通經致用之一途，若又結合勸諫功能，則以陰陽五行、災異警示結合引經說經，實在其歷史情境之下對君權進行有效限制之折衷方法。

## 五、結論

劉向先祖楚元王劉交，雅好《詩》學，不僅在少時與申公俱受學於荀卿門人浮丘伯，更有《元王詩》之次。其後，又遣子劉郢客與申公同卒業於浮丘伯，此後，元王以後家族，直可謂西漢重要之《詩》學家族。本文以《漢書·楚元王傳》所載為基礎，以劉向為論述對象，據傳中所載劉向疏奏與所序《列女傳》、《說苑》、《新序》三書為範疇，分析劉向相關著述中引《詩》之議題。

自南宋以後，輯佚三家《詩》者皆將劉向視為世守《魯詩》，而以師承之法歸於《魯詩》一派。所歸類對象為《列女傳》、《說苑》、《新序》三書。然此三書乃劉向所「序」，非屬於新撰，其材料來源多有先秦漢初之傳記舊說，以此言之，其中引《詩》則未必有《漢書》所分三家壁壘。是以王引之、徐復觀等人，同據三書而歸為《韓詩》，又近來學者復有歸於《齊詩》者，真可謂莫之所適。本文乃另立視角，以為《新序》、《說苑》、《列女傳》宜從「編纂」角度論其《詩》說之多元面貌，而不宜從「新撰」以論其一家之分。以此始得劉向《詩》學之博通與切於世用，而非膠固株守於一家之流者。

劉向所序三書，近世學者多肯認其作為「諫書」之意義，本文從之，然卻以為三書不當等觀而宜分論。就劉向所處時代而論，元、成二帝所面臨之政治困境，由原先之外戚、宦官兩事，逐漸形成外戚獨尊之局。由成帝永始元年所序《列女傳》

<sup>116</sup> 韓碧琴云：「劉向雖言陰陽災異，陰陽重報應，以嚇阻非為，此為消極之手段；禳祝無益，惟修德是圖，是乃積極之要務；而修身尚仁德，充分發揮儒家之說。」張海晏云：「就漢儒來說，意義之一是給儒家倫理尋求超自然的支持，用這種虛構的超自然力量來制衡在世俗社會的權力結構中本無節制的王權，使道統凌駕於治統之上，使自己的道德理念通過王權這個制度中介得以實踐。」兩家之說合理可參。韓碧琴，〈劉向學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29（臺北：1984），頁 577；張海晏之說見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 2 卷，〈漢代齊、魯、韓、毛四家詩學〉，頁 158。案：張海晏為《中國經學思想史》第 2 卷該章撰寫者。

《新序》、《說苑》三書觀之，僅《列女傳》之序成，最切時用。《列女傳》一書雖為趙、衛之事而發，然其書重在正向之勸勉，故就書中所序之次與所錄之事而觀，〈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等六卷為「賢妃貞婦」，是《列女傳》之重心，意在正面之「興國顯家可法則」；僅第七卷〈孽嬖〉確屬「孽嬖亂亡」。據此知劉向對漢成帝之正面勸勉，以期達致王道之政。

劉向所處之政局及序書用意兩相呼應，然不能以此等觀《說苑》、《新序》而謂兩書亦有此意。蓋兩書所見內容，與王道之事相合，具體而全面論人君推行王道之事，而非專在外戚一事。三書引《詩》多達兩百五十餘次，就引《詩》頻率而言，是兩漢諸典之最；就引經趨向而言，是引論最多之經書。西漢以《詩》為諫書，不特見於王式，亦可視為此期風尚，並副劉向諫官本色。劉向所序三書，雖或受《韓詩外傳》之著作形式影響，然引《詩》之目的與宗旨，卻不必然受其影響，蓋因以《詩》議政、勸諫，實乃春秋以來之傳統，不僅合於劉向學術之養成背景，亦與三書目的相合。且劉向所序三書，引《詩》頗存先秦風尚，而不及陰陽災異，由其資料來源在西漢初期以前，以陰陽災異扣合引《詩》之風，尚未盛行，此是三書引《詩》之異於劉向疏奏之因。

最後，本文要指出，劉向《詩》說最直接之材料，不在其所序三書，而在《漢書·楚元王傳》所載其上呈元、成二帝之疏奏。劉向疏奏引《詩》，既合「諫書」之義，有其深刻積極用世之心；又合西漢中期以後以陰陽災異說《詩》潮流，足見流風所扇，劉向亦浸染其間。如此觀之，又豈是魯、韓二家之範圍？劉向上書，篇篇緣事而發，確然為諫書，言《詩》多涉史事、《春秋》，實亦可見劉向學術涵養之展現，此種將災異與經義結合而諫戒天子之方法，實為西漢經學學者以其經術限制君權之折衷方法。

（責任校對：廖安婷）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毛亨 Mao Heng 傳，鄭玄 Zheng Xuan 箋，孔穎達 Kong Yingda 等正義，《毛詩注疏》*Maoshi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55，清嘉慶二十年 (1815) 江西南昌府學刊本 Qing Jiaqing ershi nian (1815) Jiangxi Nanchang fuxue kanben。
- 王引之 Wang Yinzhi，《經義述聞》*Jingyi shuwen*，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2000。
- 王先謙 Wang Xianqian 撰，吳格 Wu Ge 點校，《詩三家義集疏》*Shi sanjia yi ji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 王照圓 Wang Zhaoyuan，《列女傳補注》*Lienüzhuan buzhu*，《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史部第 515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 王應麟 Wang Yinglin，《詩攷》*Shi kao*，《叢書集成初編》*Congshu jicheng chubian* 第 1727 冊，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5，《津逮秘書》本 *Jindai mishu ben*。
- 皮錫瑞 Pi Xirui 著，周予同 Zhou Yutong 注釋，《增註經學歷史》*Zengzhu jingxue lish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2000。
- 汪中 Wang Zhong 著，田漢雲 Tian Hanyun 點校，《新編汪中集》*Xinbian Wang Zhong ji*，揚州 Yangzhou：廣陵書社 Guangling shushe，2005。
- 汪繼培 Wang Jipei 輯，魏代富 Wei Daifu 疏證，《尸子疏證》*Shizi shuzheng*，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18。
- 姚振宗 Yao Zhenzong，《漢書藝文志拾補》*Hanshu Yiwenzhi shibu*，收入王承略 Wang Chenglue、劉心明 Liu Xinming 主編，《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Ershiwushi yiwen jingjizhi kaobu cuibian* 第 2 卷，北京 Beijing：清華大學出版社 Qinghua daxue chubanshe，2011。
- 紀昀 Ji Yun 總纂，《四庫全書總目》*Siku quanshu zongmu* 第 2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89。
- 范家相 Fan Jiaxiang，《三家詩拾遺》*Sanjiashi shiyi*，《叢書集成初編》*Congshu jicheng chubian* 第 1744 冊，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5，《嶺南遺書》本 *Lingnan yishu ben*。

- 范處義 Fan Chuyi, 《詩補傳》*Shi buzhuān*, 收入納蘭性德 Nalan Xingde 輯, 《通志堂經解》*Tongzhitang jingjie* 第 8 冊, 揚州 Yangzhou: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Jiangsu Guangling guji keyinshe, 1996, 同治十二年 (1873) 富文齋刊本 *Tongzhi shi'er nian (1873) Fuwenzhai kanben*。
- 徐元誥 Xu Yuangao 撰, 王樹民 Wang Shumin、沈長雲 Shen Changyun 點校, 《國語集解》*Guoyu jijie*,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2。
- 班 固 Ban Gu 著, 顏師古 Yan Shigu 注, 《漢書》*Hans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62。
- 陳喬樞 Chen Qiacong, 《三家詩遺說考》*Sanjiashi yishuo kao*, 《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經部第 76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2。
- 劉 向 Liu Xiang 撰, 向宗魯 Xiang Zonglu 校證, 《說苑校證》*Shuoyuan jiaozheng*,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7。
- 劉 向 Liu Xiang 編著, 石光瑛 Shi Guangying 校釋, 陳新 Chen Xin 整理, 《新序校釋》*Xinxu jiaos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7。
- 劉 向 Liu Xiang、劉歆 Liu Xin 撰, 姚振宗 Yao Zhenzong 輯錄, 鄧駿捷 Deng Junjie 校補, 《七略別錄佚文 七略佚文》*Qilue bielu yiwen, Qilue yiwe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8。
- 魏 徵 Wei Zheng, 《隋書》*Suis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5。

## 二、近人論著

- 王啟敏 Wang Qimin, 《劉向《新序》、《說苑》研究》*Liu Xiang Xinxu, Shuoyuan yanjiu*, 北京 Beijing: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1。
- 田中和夫 Tanaka Kazuo 著, 李寅生 Li Yinsheng 譯, 《漢唐詩經學研究》*Han Tang Shijingxue yanjiu*,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13。
- 朱維錚 Zhu Weizheng, 《帝制中國初期的儒術》*Dizhi Zhongguo chuqi de rushu*, 杭州 Hangzhou: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2019。
- 朱曉海 Sherman Chu, 〈劉向《列女傳》文獻學課題述補〉“Liu Xiang Lienüzhuan wenxianxue keti shubu”, 《臺大中文學報》*Taida Zhongwen xuebao*, 24, 臺北 Taipei: 2006, 頁 49-82。
- 余嘉錫 Yu Jiayi, 《四庫提要辨證》*Siku tiyao bianzheng*,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0。

- \_\_\_\_\_, 《目錄學發微》 *Muluxue fawe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3。
- 邢義田 Hsing I-tien, 《今塵集: 卷一: 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 *Jinchen ji: juan yi: gudai wenhua de shangxia ji Zhongwai liubo*, 新北 New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2021。
- 屈萬里 Chu Wan-li, 《詩經詮釋》 *Shijing quanshi*,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1983。
- 金春峰 Jin Chunfeng, 《漢代思想史(增補第三版)》 *Handai sixiangshi (zengbu di san ban)*,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6。
- 姜廣輝 Jiang Guanghui 主編, 《中國經學思想史》 *Zhongguo jingxue sixiangshi* 第 2 卷,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3。
- 胡平生 Hu Pingsheng、韓自強 Han Ziqiang, 《阜陽漢簡詩經研究》 *Fuyang Hanjian Shijing yanji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8。
- 孫 筱 Sun Xiao, 《兩漢經學與社會》 *Liang Han jingxue yu shehui*,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2。
- 徐復觀 Xu Fuguan, 《兩漢思想史》 *Liang Han sixiangshi* 第 1、3 卷, 上海 Shanghai: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1。
- 徐興無 Xu Xingwu, 《劉向評傳》 *Liu Xiang pingzhuan*, 南京 Nanjing: 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2005。
- \_\_\_\_\_, 《經緯成文——漢代經學的思想制度》 *Jingwei cheng wen: Handai jingxue de sixiang zhidu*,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15。
- 馬 瑜 Ma Yu, 〈從劉向著作引詩看劉向的《詩》學觀〉“Cong Liu Xiang zhuzuo yin shi kan Liu Xiang de Shi xue guan”, 《雁北師範學院學報》 *Yanbei shifan xueyuan xuebao*, 22.1, 大同 Datong: 2006, 頁 60-63。
- 張 濤 Zhang Tao, 《經學與漢代社會》 *Jingxue yu Handai shehui*, 石家莊 Shijiazhuang: 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renmin chubanshe, 2001。
- 張立克 Zhang Like, 〈劉向〈條災異封事〉用《詩》考論——劉向《詩》學觀念再探〉“Liu Xiang ‘Tiao zaiyi fengshi’ yong Shi kaolun: Liu Xiang Shi xue guannian zaitan”, 《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Boha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5, 錦州 Jinzhou: 2010, 頁 80-85。doi: 10.13831/j.cnki.issn.1672-8254.2010.05.009

- 張錦少 Cheung Kam Siu, 〈論清人三家《詩》分類理論中的“師承法”——以劉向及《說苑》為例〉“Lun Qingren sanjia Shi fenlei lilun zhong de ‘shichengfa’: yi Liu Xiang ji Shuoyuan wei li”, 《嶺南學報》*Lingnan xuebao*, 4, 香港 Hong Kong: 2015, 頁 75-106。
- 陳柏嘉 Chen Bojia, 〈漢代「第五家《詩》」說獻疑〉“Handai ‘di wu jia Shi’ shuo xianyi”,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xuebao*, 63, 香港 Hong Kong: 2016, 頁 1-32。doi: 10.29708/JCS.CUHK.201607\_(63).0001
- 陳蘇鎮 Chen Suzhen, 《《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Chunqiu yu “Handao”: liang Han zhengzhi yu zhengzhi wenhua yanji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20。
- 曾小夢 Zeng Xiaomeng, 《先秦典籍引《詩》研究》*Xian Qin dianji yin Shi yanjiu*,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18。
- 湯志鈞 Tang Zhijun、錢杭 Qian Hang, 《兩漢經學與政治》*Liang Han jingxue yu zhengzh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4。
- 程元敏 Cheng Yuan-min, 《漢經學史》*Han jingxue shi*, 新北 New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2018。
- 程蘇東 Cheng Sudong, 〈劉向〈洪範〉五行學考論〉“Liu Xiang ‘Hongfan’ wuxingxue kaolu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93.1, 臺北 Taipei: 2022, 頁 1-69。
- 賀廣如 Ho Goang-ru, 〈馮登府的三家《詩》輯佚學〉“Feng Dengfu de sanjia Shi jiyixue”,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Zhongguo wenzhe yanjiu jikan*, 23, 臺北 Taipei: 2003, 頁 305-336。doi: 10.6351/BICLP.200309.0305
- \_\_\_\_\_, 〈論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之定位〉“Lun Wang Xianqian Shi sanjia yi jishu zhi dingwei”,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報》*Guoli zhongyang daxue wenxueyuan renwen xuebao*, 28, 桃園 Taoyuan: 2003, 頁 87-124。
- 黃梓勇 Huang Ziyong, 〈劉向《詩》學家法研究〉“Liu Xiang Shi xue jiafa yanjiu”, 《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Hun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22.2, 長沙 Changsha: 2008, 頁 9-19。
-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西漢經學與政治》*Xihan jingxue yu zhengzhi*, 重慶 Chongqing: 獨立出版社 Duli chubanshe, 1945。
- 葉國良 Yeh Kuo-liang, 《經學側論》*Jingxue celun*, 新竹 Hsinchu: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Guoli qinghua daxue chubanshe, 2005。
- 劉毓慶 Liu Yuqing、郭萬金 Guo Wanjin, 《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Cong wenxue dao jingxue: xian Qin liang Han Shijingxue shi lun*, 上海 Shanghai: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9。

- 蔣文 Jiang Wen, 《先秦秦漢出土文獻與《詩經》文本的校勘和解讀》 *Xian Qin Qin Han chutu wenxian yu Shijing wenben de jiaokan he jiedu*, 上海 Shanghai: 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 2019。
- 錢穆 Qian Mu,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Liang Han jingxue jinguwen pingyi*, 《錢賓四先生全集》 *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第 8 冊,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1994。
- 戴維 Dai Wei, 《詩經研究史》 *Shijing yanjiushi*, 長沙 Changsha: 湖南教育出版社 Hunan jiaoyu chubanshe, 2001。
- 韓碧琴 Han Bi-chyn, 〈劉向學述〉“Liu Xiang xueshu”,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Guowen yanjiusuo jikan*, 29, 臺北 Taipei: 1984, 頁 471-640。
- 魏家川 Wei Jiachuan, 《先秦兩漢的詩學嬗變：從“《詩》云”“子曰”到“子曰詩云”》 *Xian Qin liang Han de Shixue shanbian: cong “Shi yun” “Zi yue” dao “Zi yue Shi yun”*, 北京 Beijing: 學苑出版社 Xueyuan chubanshe, 2007。
- 羅根澤 Luo Genze, 《諸子考索》 *Zhuzi kaosuo*, 香港 Hong Kong: 學林書店 Xuelin shudian, 1977。

**Another Look at the Problem of Inheritance  
in Liu Xiang's Scholarship on the *Book of Od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of  
the Western Han**

**Chen Chih-f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fongbig@gmail.com

**ABSTRACT**

In academic circles, Liu Xiang's 劉向 (77 B.C.-6 B.C.) conception of the *Book of Odes* is mostly regarded as belonging to the tradition of the *Lu Odes*. However, there are no works specifically devoted to the *Book of Odes* in Liu's extant literary corpus. His discussions of the *Od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his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Garden of Anecdotes*, *New Prefaces* and the memorials he submitted to the throne. On the basis of the positions expressed in these writings, he became the most frequently praised scholar of the *Odes*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This study of his views on the *Ode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 An inquiry into whether Liu Xiang refers to the *Book of Odes* as the *Lu Odes* and related questions about the three books he authored.

II.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involved in Liu's composition of the three books and the problems connected with identifying his tradition of scholarship on the *Odes*.

III. An analysis of Liu Xiang's memorials that cite the *Odes* recorded in the *Han History*'s "Biography of Chu Yuanwang."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cast doubt on the theory that Liu Xiang wrote the *Lu Odes*, arguing that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view this issue from a broad perspective. Among the three books written by Liu Xiang, only the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has a strong practical political purpose. The content of the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differs from the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of kingship found in the *Garden of Anecdotes* and the *New Prefaces*.

Ultimatel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memorials sent by Liu Xiang to Emperor Yuan and Emperor Cheng, which discuss the *Odes* in connection with *yinyang* 陰陽 correlative theory, are different from the views of the text he expressed in his three books. The position he adopts in his memorials is in line with contemporary scholarly trends and the practices of remonstrance officials at the time.

**Key words:** Liu Xiang 劉向, *Book of Odes*,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Garden of Anecdotes*, *New Prefaces*, *Lu Odes*

(收稿日期：2022. 5. 31；修正稿日期：2022. 8. 22；通過刊登日期：2022. 10. 19)

